

鲁迅哲学思想 在厦期间发生重大变化

厦大中文系教授俞兆平《哲学的鲁迅》一书近日出版



WENHUA
ZHOUKAN

品读

投稿邮箱: whzk@xmrb.com

A04

责编 许舒昕
2023年3月26日 星期日
美编 陈聪荣

边走边读

名物学传统 与匠人精神 ——评《燕食记》

●易文杰

葛亮所著小说《燕食记》一出版,就引起学院与市场一致赞赏。其妙处何在?笔者认为,小说绵密入微的岭南名物书写,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名物学传统,蕴藉深厚。

中国古典文学多有名物书写。从《诗经》《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到《山海经》《博物志》中的灵兽异物,再到《红楼梦》《镜花缘》中的世情名物,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物学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名物书写也是葛亮一贯以来的文学语法。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雀》中的鸟型兽“朱雀”,到《北鸢》中的风筝,“名物”与他的小说密不可分。在中篇小说集《瓦猫》中,葛亮更集中展开对“名物”与“匠人”之间辩证关系的刻画,而“名物”之上也凝聚着久久不灭的光彩。《燕食记》则继续对名物展开书写,但又有所新变——葛亮把深细的笔触放到了“饮食”这一名物之上,刻画美味佳肴的历史渊源与烹饪手艺。太守羹、孝亭羹、雾水荔枝……种种美食名物琳琅满目,令人食指大动。

小说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对“名物”的书写,更在于以“名物”来“立人”。小说中关于名物的书写,立起了小说中鲜活的人物——一个个用手艺传承传统文化的匠人。

小说采取双线叙事结构。上网描写粤菜师傅荣胎生大师傅的厨艺,凸显了一个敬业、虔诚、一丝不苟的“大按师傅”。值得指出的是,他把大量心血都放在做莲蓉上。他做出的莲蓉“温软厚糯”——这也可以形容他的性格。厨艺与人品之间的密切关联呼之欲出:人在磨炼手艺,手艺何尝不在磨炼人?小说下网则把重心放在书写荣氏弟子陈五举的成长。他在荣胎生的磨炼与教导下,成长为了一块美玉,也成了荣胎生亲手选定的继承人。然而,他却入赘了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荣胎生从此与其断绝关系。虽陈五举多次探访,却不得门而入。幸运的是,两人虽相爱相杀,但未有大悲剧的遗憾。小说最后,两人在电视烹饪大赛中重逢,并在“一开一合一鸳鸯”的赛题下,合力完成了“鸳鸯月饼”“鸳鸯月饼”这一食物的命名也蕴含中国古典传统的人生哲学。

对文学而言,实证的物质书写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通过坚实的物质建立起精神大厦。葛亮的写作,正是如此。在《燕食记》中,葛亮对“物”的写实功力依旧了得,现实主义所谓“细节的真实”所在多有。而他的饮食书写,不仅写出了日常生活中切实的质感、温度、重量,更写出了一种匠人精神。这种匠人精神与当代提倡的“工匠精神”若合符节。在这个意义上,葛亮的《燕食记》不仅富有古典斯文的风雅之美,更具有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真实性。他那些细致的名物书写,不仅是一个个真实的细节,更指向更高的“历史真实”——小说上半阙荣师傅的厨艺成长历程,与辛亥革命以来民国广东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密切相关。而小说下半阙陈五举的奋斗史,更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腾飞相关……小说对历史传奇的叙述,则通过“我”——一个正在进行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整理的青年学者展开。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节与关联之间,在粤与港的流动与互动之间,无疑蕴含着葛亮对时局与未来的关切与期许。

B 在厦期间,鲁迅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

记者:您在书中论及,鲁迅在厦时期哲学思想发生了转换。您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发生了这一转换?

俞兆平:以往对鲁迅与厦关系的研究,偏重于鲁迅生活事项的描述或是与许广平《两地书》来往的情爱评说,而对于1927年9月鲁迅在广州所说的“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句话,缺少盘根究底的追索,这是很大的遗漏。

鲁迅一生的思想若简要概述之,则是在梁启超所归纳的两大观念中选择:从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转换到马克思的“多数之强者为少数之弱者所压迫”的理论基点;即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这一从尼采的“劣制优”,逐步转换为马克思的“强压弱”的哲学观念,主要呈露于他1926年11月的《写在〈坟〉后面》《〈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等文章,以及到集美学校所做《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的演讲中。

我认为,鲁迅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节节胜利有关,鲁迅在《两地书》中就跟进许广平提及4次战况。他认为,北伐战争的成功来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这让他很受震动。我在书中论析道:无数青年和工农以鲜血铸成的革命真实,无数青年和工农以生命换来胜利情景,构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击着鲁迅旧有的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观念。

记者:有人说,鲁迅在内外交困中离京南下,在厦期间他的思想比较悲观消极,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俞兆平:鲁迅思想是悲寂,但不是消极。在厦短短四个多月,除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外,还撰写了学术论著《汉文学史纲要》《嵇康集》考;创作小说《铸剑》《奔月》,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以及留下自然地坦露情怀与思想的《两地书》中许多重要的信札……成果之丰硕,用“惊人”来评定,一点也不为过。“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面对恶劣环境,鲁迅孤身作战,难免产生寂寞悲哀之感,但他还是保持着顽强的斗志。这在此时写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出,他在现实作“绝望的抗争”。

记者:厦的风土特质是否对鲁迅产生影响?

俞兆平:2023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登了最近新发现的,鲁迅1929年在北平演讲《没有什么感想》一文。这篇文章记录了鲁迅当时所说的厦,与以往有所不同。鲁迅说:“厦门大学,在一个荒岛里面,对于教员,是极优待的——有教员的住室(有太太的是例外)……一切的供给,应有尽有,有的还有终身的聘书;只欠自己的坟墓没有做好。所以在那里是极愉快的。”对厦门的印象并不像他在《两地书》等所写的那么不满意。鲁迅接着谈到离开厦的四个原因:第一,该校不让学生参加党派活动;第二,厦门洋气太盛;第三,不能违抗校长及上司;第四,一年不分四季,十月还有石榴花,像是故意和我捣乱。第四点倒与风物有关。这篇演讲是新的珍贵史料,它的重现值得厦门鲁迅研究者关注。

对话

A 从哲学视角解读鲁迅精神“密码”

记者:您为何选择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

俞兆平:我之所以从哲学视角来研究鲁迅,来自一次阅读感悟。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有这么一句话:“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也就是说,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身后大都站着一位或几位先哲,都有自己的“家谱”。那么,鲁迅自己呢?后来,我在鲁迅1932年为一位青年作者的诗学论著所写的“题记”中得到答案:“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撮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挐领,粲然可观”。纵观古今,横览欧亚,博采诸家,综合万汇,便是鲁迅哲学思想的特点。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浑圆的整体,包括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任何单一视角的切入,都无法完成对它的完整把握。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发展中的政治事件往往成为对鲁迅论著及思想解读与判断的先决前提;而和政治学处于同一或更高层面的哲学,却缺乏深入探究。像鲁迅与严复译著、鲁迅与卢梭哲学等皆是,即使是成为热点的鲁迅与尼采关系,也有不少篇幅停留在词句相互对照的平行比较,未能进入精神内里的溯源与求索。只有向着哲学的高度提升,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能深刻领悟鲁迅的论著何以在今天仍具如此强大的历史穿透力。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哲学的鲁迅》有哪些新的突破和亮点?

俞兆平:其一,鲁迅对严复的《天演论》采用了哲学上的“扬弃”立场。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物进化论,鲁迅是遵从的;对弱小民族宣扬斯宾塞的“天行”说,他是赞同的;而对跟从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者,则以赫胥黎的“人治”予以抨击。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困境,促使鲁迅最后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其二,鲁迅《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与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有关,其意旨在于批判由小人与庸众所组成的“国群”,对“小己”中“孤独的精神战士”的压迫、暴虐,“吃人”的意象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鲁迅喊出中国历史“吃人”,类同于尼采的“上帝死了”,都代表着“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

其三,国内外学界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疏漏是,止于尼采,不再推进至卢梭。鲁迅的“搭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主义的质疑;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调整。

其四,鲁迅前期的“力”之观念,是以尼采“强力意志”为核心,他钟情尼采哲学的原因是,中国从汉唐时期的雄健阔大变为晚清的孱弱萎靡。为使中国浴火重生,他求助于尼采的强力意志,求取生命本体的勃发与飞扬;坚决于深沉韧性的战斗。1930年前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美学,逐步疏离、告别了尼采哲学。

其五,鲁迅接纳马克思主义。鲁迅在厚重的中国经验的基础上,



厦大校园内的鲁迅雕像。(郭琛悦 摄)

化融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对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哲学、美学的接纳,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独特回应。

其六,鲁迅对于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其相争”。鲁迅当时冀盼的是在精神上彻底觉醒的革命先驱者,而非以权力、金钱、女人为“革命”目的的阿Q式的人物。阿Q这个人物形象原型的身份定位,如鲁迅说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的成分较大,其最主要的个性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与投机革命。

上述六点或可视之为本书亮点,为现今国内外学界的鲁迅研究增进一些生机与活力。

读书沙龙

照见个体生命的苦痛与挣扎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艾伟长篇新作《镜中》分享会在厦举行

文/本报记者 张觉尹

日前,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长篇新作《镜中》分享会在厦门纸的时代书店举行。著名批评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厦门著名作家须一瓜,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共同出席。四人围绕无常境遇与生命欲望、日常经验与精神世界、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展开交流。

《镜中》讲述了一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望的建筑设计师在遭遇人生重大变故后,重新思索生命的意义并寻求自我救赎的故事。小说延续了情爱、罪责等创作主题,揭开人心中赤裸而真实的欲望,刺破爱恨苦痛的虚妄,并进一步探问何谓“生”的本质。

关于小说主旨,张清华以“两面镜子”的比喻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谈到,《镜中》是一部与博尔赫斯的诗作《镜中》构成互文关系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文本。“只要稍加审视就能发现,我们每个人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反影。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在经验中的世界,绝不是一个终极真实的世界。”其次,《镜中》的故事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在世界赤裸而鲜活的感性表象背后,其实是极理性、冷静、荒凉的所在。艾伟描写两对世俗男女于情网中纠缠,“最后并没有把我们引向对世俗欲望的沉溺和热



分享会现场。(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供图)

爱,而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悲凉,由此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相通。

须一瓜分享道,阅读小说的过程她时常感到一种“幻肢痛”。艾伟把中国、日本、缅甸、纽约的材料,搅拌得如此结实、光滑,许多部分犹如岁月包浆,自然真切。小说中的几位主人公基本都处在闭环状态上的一种交战,但是从离奇到平常,艾伟衔接得非常自然。爱情是世上最不对称的情感,但艾伟就敢密集地把这几串严重不对称的爱,放置在他严格对称的篇章中。“就像拉链坏掉,拽不住的包,里面拥堵着人性的不安与骚动、获得与失守、责任与推卸、愤怒

与愧疚、欺骗与抵抗、仇恨与宽恕。这些对称情感在作品中一一对应地出现,密度之大令人喘息。”

曹元勇表示,写日常生活的表面现象、表层经验的作品,每年都有很多。艾伟却能穿透生活表象,写出表象背后的隐秘,以及人物深层精神脉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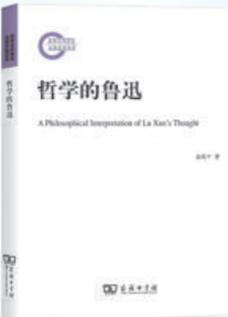
艾伟说自己大学学的是建筑,因此在这部小说中,采用反时间的叙事结构,以文字的方式建构出空间艺术。小说的四个部分如同同一座建筑的四个房间,光线穿行于其中,串起回环往复的整体图景,照见个体生命共同的苦痛与挣扎。

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兆平退休后做起了鲁迅研究,引起学界关注。他说:“闲云野鹤久了,精神有点寂寞,冥冥中仿佛书架上鲁迅在望着我一样,于是捧读了全集。”

其实,俞兆平与鲁迅早有缘分。20世纪70年代末,他便师从以鲁迅研究闻名的许怀中先生,隔了40年之后总算真正承接了老师的衣钵。

鲁迅研究已逾百年,其研究资料可以说已是硕果累累、卓见迭出。由于生活阅历、人文积累的增长,退休后的俞兆平再读鲁迅已与年少时有了不同的悟解,他特别关注到了鲁迅的哲学思想,陆续撰文刊出,进而结集成《哲学的鲁迅》一书,不久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日,俞兆平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说,厦时期是鲁迅思想发展史的关键点。



人物名片

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

市图“名人赠书馆”上新

陈国强教授等图书捐赠仪式暨“追忆旧时光 结缘图书馆”赠书始末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李颖 记者 许舒昕)近日,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城馆区举办陈国强教授等图书捐赠仪式暨“追忆旧时光 结缘图书馆”赠书始末分享会。

据悉,此次收入了2019年陈国强教授家属林瑞霞女士等捐赠图书音像资料共549种838册、期刊共122种195册、近1万页书信手稿及证书、奖状等资料;2019年郭志超教授家属郭航先生捐赠图书3585种4044册,期刊41种50册;2022年郭坤聪先生家属郭清微女士等捐赠图书及电影资料753种842册,期刊56种145件;2022年陈金城老师家属捐赠图书406种474册。以上书籍均已整理上架至厦门市图书馆“名人赠书馆”。

捐赠仪式上,市图书馆与各位家属朋友签订图书捐赠协议,并颁发捐赠证书,同时邀请他们分享赠书始末的故事。市图书馆长期致力于地方文献征集和传承工作,2018年集美新城馆区开馆后,特别设立了“名人赠书馆”,吸引了15位专家学者把毕生收藏无偿捐赠给市图书馆,藏书3万多册。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呼吁市民朋友踊跃赠书,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中来。